

学习有理

聚五合力,助力科技领军企业应用性基础研究

殷志军 童志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新时期,基础研究在产学研融合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与体系化基础研究和探索性基础研究相比,应用性基础研究具有鲜明的市场导向特征,这决定了企业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应当在应用性基础研究中承担主体角色、发挥主导作用。对企业发展而言,开展应用性基础研究是从“做产品”到“做服务”再到“定标准”甚至引领产业变革的必由之路;对区域竞争而言,应用性基础研究是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主战场。

与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相比,我省基础研究科技资源相对薄弱,但科技领军企业数量较多,到2023年已累计培育科技领军企业100家。尤其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清晰认识到科技创新对企业立足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企业研发经费在总研发经费中的占比稳步攀升,2023年达到69.2%,全国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前10名中我省有3家入围(阿里巴巴、吉利控股、蚂蚁科技)。这些科技领军企业不仅研发投入力度大,更是勇于向行业“卡脖子”难题发起挑战。部分企业凭借强大的科研实力与创新精神,成功攻克了行业内的关键技术,率先涉足应用性基础研究领域,为全省乃至全国的企业树立了榜样,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在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我省在加快补齐基础研究科技资源短板的同时,需要更加重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作用,进一步凝聚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人才和金融五方合力,加快形成科技领军企业主导应用性基础研究的新格局,搭建协同创新平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推动我省科技创新迈向新高度,在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区域高质量发展中抢占先机。

聚企业的黏力,发挥企业对优质创新要素的黏合主导作用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更是应用性基础研究的主体。企业身处一线,能够敏锐地感知、捕捉市场需求的新变化新动向,熟悉创新要素的分布规律和合作机制,因此在通过市场机制黏合优质创新要素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在整

合创新资源时也更具针对性、落地性。研究选题上,企业凭借对行业需求和市场反馈的精准把握,更容易提出既接近市场客户需求又契合基础研究动向的攻关课题,进而推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和基础底层技术攻关上实现有效突破。此外,领军企业可以发挥组织和资金优势,在国际竞争中能够切实承担起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在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研究形态上,可以结合问题类型,针对企业个性问题,加快形成领军企业“自主研发+定向委托(委托专门研发机构)”的融合式研究形态;针对行业共性问题,探索采用“领军企业+中小企业”的组团式研究形态,鼓励领军企业牵头组建行业发展战略研究机构,带动行业相关企业共同开展产业方向识别、技术标准创制、知识产权布局等重大战略方向研判。资金要素上,鼓励领军企业设立一定比例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专项经费,企业与企业间共同设立创新研发基金,鼓励与自然科学基金等政府性研究资金建立联合基金,推动各类研究资金形成合力。

聚政府的定力,全心全意改进企业创新服务环境

各级政府要做好领军企业应用性基础研究的服务和保障,持续在规划引领和要素保障等方面做好工作。规划引导上,将企业应用性基础研究置于科技创新规划的重要位置,紧密融合“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315”科技创新体系和国家科技创新资源布局,结合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未来趋势,适时启动编制企业应用性基础研究专项发展规划,细化明确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和任务举措,让企业创新发展做到眼里有光、心中有数、脚下有路;提高企业对重大科研项目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企业人才在各级科技专家库中的比例。服务机制上,建立常态化跟踪机制,及时跟进企业创新进程,做到引导而不干预,搭建线上线下信息沟通渠道,收集企业研发需求,为其提供增值化政务服务,在加大力度培育科技领军企业的同时,制定优惠政策,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助力领军企业升级成为集创新型创新链主。平台建设上,支持创新能力突出的企业积极参与新型实验室体系和新型研发机构体系建设,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深度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等基础研究平台,鼓励有条件的领军企业牵头组建省实验室。同时,整合科技基础设施、科研基础数据库等资源,加大向企业开

放的力度,让企业能够便捷获取科研资源,降低创新成本。成果保护上,加大对应用性基础研究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立企业研发商业秘密保护机制,严格规范信息管理,在课题申报、项目验收等管理过程中保护企业研发活动的关键信息,完善应用性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估机制,让企业创新成果能够更快更好地落地。

聚机构的眼力,助力企业及时发现应用研究新赛道新价值新市场

高校和科研机构拥有深厚的知识积淀和敏锐的科研洞察力,是企业在应用性基础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方向指引上,科研机构可以积极搭建前沿技术监测平台,借助大数据分析工具和人工智能算法,对全球范围内的科技信息和产业动态进行地毯式收集,筛选处理海量的科技文献、技术报告以及专利数据,快速提炼出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研究方向,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指引,助力企业提前布局,抢占市场先机。合作交流上,完善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交流机制,通过定期举办产学研对接会、技术研讨会、项目路演等活动,为企业和科研人员搭建面对面交流平台,不仅能让企业第一时间了解科研机构最新成果,企业反馈的实际需求也能引导科研机构及时调整研究方向,促进创新要素的双向流动。资源整合上,鼓励科研机构针对企业的特定需求,组织行业顶尖科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研发人员成立联合研究团队,合力开展重大研究攻关,将机构的科研眼力与企业的市场感知力相结合,共同挖掘那些被忽视但极具潜力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方向,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新机遇和价值增长点。人才发现上,科研机构还可以帮助企业发掘和培育高素质研发人才,让青年科研人员既能接触到前沿学术理论,又能深入了解产业实际需求,快速成长为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

聚人才的活力,丰富人才参与企业应用性基础研究的路径

人才是企业应用性基础研究的核心要素,要激发科研人员、技术专家和工程师等各类人才参与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构成企业创新的“最强大脑”。人才流动上,建立灵活多元的人才柔性使用机制,打破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之间长期存在的人才

流动壁垒,促进人才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共享,以双聘制度为突破口,让科研人员可以在企业、高校或科研机构之间灵活任职。政策激励上,对于在企业应用性基础研究中有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丰厚的物质奖励和荣誉表彰,大幅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收益分成比例,设立专项奖励基金,为优秀人才的持续创新提供充足资金支持,加快完善研究成果转化的企业入股机制,将人才利益与企业发展紧密捆绑,激励人才持续创造价值。氛围营造上,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尊重和包容不同类型人才的创新思维和工作方式,为他们提供自由探索和实践的空间,建立创新容错机制,包容探索过程中的失败,消除人才的后顾之忧,让各类人才在企业应用性基础研究中充分释放活力。

聚金融的耐力,加大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支持

对企业而言,应用性基础研究是高风险、高投入的投资活动,从实验室成果到市场检验,耗时长且中途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需要大量金融资本的耐心呵护;对政府而言,加大金融对企业应用性基础研究的支持,也是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关键举措。政府资金方面,探索设立科技领军企业应用性基础研究专项基金,建立为企业创新保驾护航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建立与应用性基础研究周期相适应的中长期资金支持机制,制定分阶段拨款计划,杜绝因资金拨付不及时等原因导致研究中断。民间资金方面,鼓励民营企业家个人或家族,通过设立私人基金会、家族母基金等方式,支持应用性基础研究,凭借其灵活的决策机制,快速识别有潜力的科研团队和项目。金融服务方面,大力推广投贷联动模式,深化“浙科贷”、“专精特新贷”、“人才贷”、“企业创新积分贷”、“技术交易贷”、知识产权抵押贷款、“创新保”等特色金融产品应用,综合发挥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机构作用,为企业应用性基础研究提供全周期资金接续服务。产业联动方面,引导应用性基础研究成果尽早对接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风险投资机构,鼓励领军企业成立企业风险投资基金(CVC)中心,加快自身及行业研究成果的产业转化,推动应用性基础研究与产业技术创新发展。

【作者为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基地研究员】

知名专家说

姚景源:1983年吉林大学世界经济系研究生毕业,取得硕士学位。曾在原国家经委、商业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国内贸易部、中国商业联合会等多个部门任职,曾任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安徽省阜阳市市长、安徽省统计局局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等职务,现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从8个方面提出了30条具体措施。该方案是对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的深化落实和详细部署,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大力提振消费的坚定决心。

从数据来看,全国人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3%。然而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人们有钱了却不花钱。如何让大家把手里的钱花出去,让消费者敢消费、放心消费、方便消费?这是未来大力提振消费必须攻克的难题。

第一是敢消费的问题。长久以来,中国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统计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长期保持在36%-45%之间,远高于全球25%-27%的水平。不能否认的是,高储蓄率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和中国经济的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我们也看到,全国大量的储蓄实际上是一种保障性储蓄,因而低收入群体的储蓄率反而更高。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的不充分和预期不稳定,导致居民需要通过储蓄来进行自我保险。当家庭财务规划中保障性储蓄比例过高时,势必会挤压即期消费空间。想让老百姓敢消费,就要下大力气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完善加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比如,针对看病贵的问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政府补贴的支出可以适当增加,缓解个人承担医保的压力。同时,进一步推动城市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如建立远程医学影像诊断中心,让人们足不出县,甚至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另外,还可以探索建立重大疾病医疗费用政府托底机制,切实消除“因病致贫”的隐患。再比如,针对教育问题,政府可以增加奖学金的支出,提高其覆盖比例;提供低息或无息的助学贷款,延长本金的还款期限,切实减轻年轻人及其家庭的教育负担。针对养老的问题,应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推动“物业+养老”“社区食堂”等新型服务模式,在解决老年人生活保障问题的同时,助力银发经济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归根到底,政府财政的钱就是要花到人身上,花到民生改善上,让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感触体会。老百姓未来的预期稳定了,储蓄的压力减轻了,消费的动力自然会大大提升。

第二是放心消费的问题。刚刚过去的“3·15”,又有一系列食品安全、假冒伪劣产品、消费欺诈、隐私安全等问题被曝光,老百姓对消费环境的担忧和质疑并非空穴来风,消费市场的信任缺失已成为制约消费升级的重要瓶颈。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重塑消费者的消费信心需要建立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流程的质量信用体系,大力维护市场秩序,培育良好的商业道德。在生产端,可以积极探索运用区块链等技术,对婴幼儿奶粉、药品等特殊商品实行“一物一码”全程监控。在流通领域,要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对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新业态实施跨区域、跨平台消费纠纷处理机制,既鼓励创新又防控风险,同时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监管。另外,对消费环境乱象的执法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以食品安全问题为例,一些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拥有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双重权力,有权对违法生产经营者处以刑事罚金甚至采取人身强制措施。企业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其面临的罚金往往是天文数字。从世界上的先进经验来看,我们对制假售假等行为除了要提高行政处罚标准,还可以采取行业终身禁入等举措,让违法成本远高于违法收益,最终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协同治理格局。

第三是方便消费的问题。当前消费便利性存在的短板,正在成为阻碍市场活力的新问题。当老年人被数字支付的高门槛困扰、乡镇居民受制于物流配送的薄弱环节、年轻消费群体面临同质化供给的审美疲劳时,大量潜在的消费需求就难以真正转化为市场动能。要打通这些堵点,需要从供给侧进行系统性革新。在支付环节,应当打造分层递进的体系架构——大额交易保留刷卡渠道、小额消费推广扫码支付,同时坚守现金兜底的传统服务,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支付方式。对于县域市场而言,既要扶持本土电商平台成长,也要引入“即时零售”等创新模式,真正消除城乡消费体验的鸿沟,让现代商业服务惠及每个角落。乡村的物流建设要重点突破“最后一公里”瓶颈,通过加密智能快递柜布点、推广农村共享代收站等创新模式,把商品高效送达农村消费者手中。服务供给则需深度挖掘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培育更多既有烟火气又可推广的社区商业形态,用差异化服务激活细分市场。近段时间以来,通过对签证、支付、服务等环节的系统优化,外籍人士的入境旅游消费实现了爆发式增长,这印证了消费便利化改革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本报记者 潘如龙 吴晔 张竞聪 采访整理】

姚景源



扫一扫 看视频

发展耐心资本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杨晓伟 周芷帆

之江青年论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创投基金差异化监管制度,强化政策性金融支持,加快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

耐心资本是相对于“不耐心资本”而言的。它不以短期收益、赚“快钱”“热钱”为旨趣,专注于打基础、利长远,更注重长周期收益预期,通常不受市场短期波动干扰,是对资本回报有较长期限展望且对风险有较高承受力的资本。耐心资本在发展大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升级、维护经济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将有力促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建设金融强国等重大战略的推进实施。全面认知、理解与发展耐心资本,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一是各级政府与企业、资本特别是耐心资本的关系

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企业、资本特别是耐心资本的关系,构建适宜的社会生态。一方面,需要在法律上、政策上明确耐心资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要把“两个毫不动摇”贯

彻到对耐心资本的认知中。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要进行全局性、系统性考量,注重各个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确保政策连续性和监管有效性。既要优化激励制度,给予耐心资本充分的保障;又要完善相应的约束机制,为耐心资本发展扫清障碍。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与各类资本主体包括各类耐心资本主体保持适宜边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二是正确政绩观与耐心资本的关系

耐心资本是长期资本。各级政府要认识到耐心资本是相对于短期投资而言的长期投资资本,是具有明确指向性、长周期成长性、风险规避性和总体收益性的中长期投资。应抱着“久久为功”的战略思维和“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观,把对耐心资本的培育、引导及时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三是资本的结构与耐心资本的结构性布局关系

我国的国有资本、社会资本与国际资本在法律地位与市场地位上是平等的,因而在对耐心资本的支持、培育、引导方面也是平等的,但就耐心资本的结构化、体系化布局构建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差别。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各级政府要引导三类资本主体布局耐心资本,主要流向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领域,推动产业空间载体建设以促进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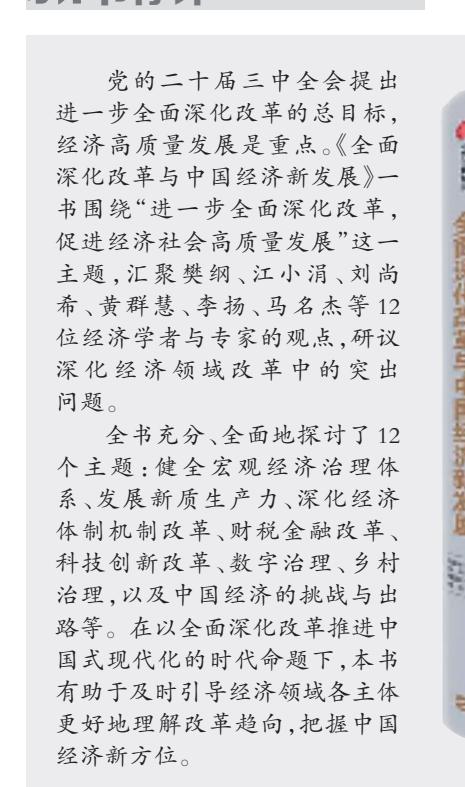
成新质生产力,做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增量“蛋糕”。特别是各种资本及企业主体,投入研发的资金比例在整个公司预算中要有一个标准。对于一般性国民经济部门与以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慈善等为代表的国家计生工作的兜底性工程,各级政府也要鼓励三种资本主体布局耐心资本,以长周期发展理念筑牢共同富裕的根基。对于国家重大安全领域,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考虑,主要鼓励国有资本、社会资本领域的耐心资本积极进入重要、重大、关键基础研究领域,特别是那些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卡脖子的、亟待突破的重要、重大基础研究领域。

四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耐心资本布局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的指示之际,把资本、技术、设备、人力等资源引到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把中长期投资倾向的耐心资本积极、有序地引到中西部地区,对于解决国家整体经济地理发展不平衡、实现共同富裕、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各级政府要引导各类耐心资本积极、有序地投入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将耐心资本投向中西部地区交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嘉兴大学基地、西北工业大学】

新书荐评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



重要窗口 理论周刊·知行